

刘自然著

风雨华章

(自传)

车敏照题



第一章 童年颠沛历尽苦难

(1924.4-1940.12)

1924年4月25日(农历三月二十二日)我生于吉林省双辽县郑家屯(双辽县,1913年定名辽源县,隶属辽宁省,新中国建立后划归吉林省与双山县合并,现称双辽市)。

双辽市位于吉林、辽宁、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南有东辽河,西有西辽河。该县的王奔镇三江村素有“鸡鸣闻三省”之美誉。自然环境处于戈壁沙滩东端,科尔沁大草原与松辽平原相衔接地带。

中华民国之初,郑家屯已发展为政治、军事、交通和商业重镇,是一座开发较早的老县城,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两桩事出名:一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盟友吴俊升由洮源镇守使升为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在郑家屯大兴土木,建起行辕,俗称大帅府,并屯兵驻守,与蒙古军阀陶克涛胡长期对峙;二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出生在郑家屯并读书,家开烧锅(烧酒作坊),19岁由吴俊升做媒与张学良缔结良缘,并在郑家屯度蜜月。

我的父亲河北省蠡县人,民国初年才20岁左右,那时他头带发辫只身闯关东,来到郑家屯落脚。父亲从小在家学成织布手艺(木制布机),到东北当初给别人吃“劳金”(即打工)织布,后来自己顶门户开作坊——刘机房,上机织布,另雇二、三个打工。母亲是郑家屯生人,娘家姓孙,家里开袜子铺,用土织布做布袜子卖,叫孙袜子铺。

家贫难以糊口

我出生时，父母亲已有两个孩子，哥哥长我3岁，姐姐长我1岁。那时父亲生意红火，家里生活充裕。但好景不长，日本洋布大量充斥东北市场，手工织布竞争不过洋布，家里作坊倒闭。父亲失业，家庭生活困难，我两岁时母亲怀抱着我，举家5口投奔通辽县（现属内蒙哲里木盟）大舅父处。大舅父开袜子铺，也兼做帽子，蒙古族人喜欢穿布袜子，生意还好。父亲在舅父的岳父（外号张晃头）开的张碗铺打工，卖碗筷、镰刀、锄头生活生产用具；张晃头懂蒙语，秋冬季节到草原各蒙古包做生意，带去碗筷、火柴、烟叶、白酒、红茶；换回牛羊皮张、羊毛、驼绒等产品。父亲给他赶毛驴车，四、五头毛驴拉一台车，不敢用马拉车，怕土匪抢马。家里生活还能维持。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土匪四起，兵荒马乱，张碗铺黄了，父亲又失业了，靠在街头卖零工、做小生意度日，难以糊口。这时，我又添了两个妹妹，7口之家只靠父亲一人赚钱养活，日子实在难过。夏天哥哥领我上甸子挖野菜，母亲把野菜摘净煮熟，攥成团周围滚上薄薄一层包米面，再上锅蒸叫“菜团”。这种东西吃后肚子鼓鼓的，拉绿色稀屎，干活不经饿，很快肚子咕噜咕噜叫，又饿起来了。我从小尝过挨饿滋味，那时想的是：能吃饱肚子是最大幸福，羡慕有钱人家孩子，不愁吃，不愁穿，不受冻，多美呀！

9岁那年数九寒冬，北风呼啸，冰天雪地，家里没有柴烧，租住的屋子四处透风，北面墙上挂满冰霜，晚上煤油灯一照，亮晶晶的，格外显眼。

哥哥经常领我到距家 10 多里的郊外搂树叶，当烧柴取暖，这条道上要过 3 个险关：

一是过辽河。冬天结冰的河面象镜子一样滑得很，人踏上去发出“嘎嘎”声响，象要破裂把人沉下去，我害怕极了！

二是过坟茔地。这是往返必经之路，旧社会穷人死了到处乱埋，有的连棺材也没有，用席子一卷就扔出去。死尸被野狗啃的人头四肢残缺，随处可见，黑夜里一不小心就会踩上，真吓死人！

三是过野狗群。过去有句俗话：“城里的孩子，乡下的狗”，意思是“不好惹”。野狗个头长的象牛犊那样大，见人就猛扑过来，吼叫不停，吓得我不敢挪步，每当这时，哥哥就护着我，牵着我的手给我壮胆，告诉我：野狗扑来千万不能跑，要迎面而立，不惹它，骂它几句，它就蔫退了。

在这条恐怖路上，我和哥哥不知走了多少个冬春？

出去打柴，妈妈给哥哥和我每人一个包米面饼子，这是只有在出去干活时才有的“待遇”，哥哥总是把大一点的给我，我揣在怀里，肚子饿了就想吃，哥哥劝我要忍着点，说等把柴拾完，往回走之前再吃，否则背着柴走 10 多里路没劲。把柴捆好哥哥总是先帮我把柴放在背上，再去背自己的。有时天黑了，已是满天星斗，我们还在路上，哥哥怕我害怕，怕我累，故意扯闲嗑，给我讲北斗七星的故事。快到家时总会远远看到妈妈顶着寒风站在门口等待着我们归来，那辛酸的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我家做饭的锅台旁放有风匣，姐姐小小年纪一手拉风匣，一手将柴禾不断送进灶堂。谷瘪糠、牛粪也当柴烧。通辽那地方盐碱地多，柴草稀少，烧的非常困难。冬天屋子冷，手脚冻得象猫咬的一样难受，没办法只好在炕上放一个火盆，

火盆是泥做的，把未烧烬的柴灰放进去，大人孩子就围着火盆靠柴灰的余热烤手取暖。

冬天没有野菜充饥，就到豆腐房买豆腐渣吃，那本是猪的饲料，我家把豆腐渣掺一点包米面蒸窝头吃，或掺在米里煮粥吃，还到粉房买“毛粉”（即不成条的粉头及沉淀在粉锅底的粉渣），象豆腐渣那样充饥。现在知道粉条中含铝，不可多食，“毛粉”含铝更高，是对人体有害的东西，但那时那管得了这么多，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记得那年夏天，我家因没钱按月交房租，房东婆进门来气势汹汹，问今天交不交房租？母亲哀求说：实在没有钱再缓几天吧，房东婆不容分说，动手将我家饭锅强行拔下扔在院子里，声言不交房租撵我们马上搬家。吵闹声惊动了左邻右舍，有的来看热闹，有的帮助说好话，人越来越多，这一切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心想什么时候能住上自己家的房子，不再受这个窝囊气！

我现在真的住上自己的房子（享受正厅级待遇）。“三气”外加空调，家电齐全，五室一厅，建筑面积 148 平方米。住上自己房子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父亲外出打工不回来，家里揭不开锅，吃上顿没下顿，经常是全家出动挣饭吃。妈妈放下家里活给大舅父家帮工，姐姐给人家纳袜底，纳十双袜底赚一角钱，我和哥哥俩分别给网户（用网捕铁雀者）当“小打”，每到冬季辽河上铁雀特多，网户要顾“小打”，东奔西跑把雀群轰向网边，以便捕捉。网户为抢占上风头下网，天刚亮就让我跟随出发，一天跑下来累得要命，几天就把鞋跑坏了。赶网不给工钱，只是带出一张吃饭的咀，如收获好了，一天能分得 10—20 只铁雀。我们还把网户的铁雀揽回家，晚上全家人在煤油灯下摘铁雀毛，把

毛摘净每 10 只用麻线扎一捆，每加工 100 只只赚 5 只铁雀。赚来的铁雀自家舍不得吃，到市上卖钱换米。

10 岁那年冬天，寒风刺骨，白雪皑皑。眼看春节即将来临，有钱人家杀年猪办年货，可我父亲在外打工不归，家里揭不开锅。母亲吩咐哥哥和我带上口袋去大舅父家借粮，大舅给了一斗（约 15 公斤）高粱，我们背回家来。送碾坊加工要付加工费，米糠还要留给人家，哥哥说：“咱自己加工。”于是先把高粱沾水弄湿，用缸（盛水用）作臼，拿木棒捣米，没想到捣了几下，咔嚓一声，竟把缸底凿掉了。见此情景母亲哭了起来，饿了一天等着吃饭的孩子们也都哭起来，刚刚出生几个月襁褓中的小妹（自清），因没有奶吃也哇哇哭叫，全家人哭成一团。那凄凉悲苦的情景我依然记忆犹新，现在写到这里我的心还很酸楚。那年月穷人家的日子真难哪？后来，好心邻居借碾子帮助把高粱破碎，不除糠和壳子，俗称“高粱破子”（全高粱），那年春节我家就是吃这种饭过的年。

渴望上学读书

我家前边有所学校——通辽县立第四完小。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朗朗读书声，我常去学校从墙豁口看学生下操作游戏，我多么想上学念书哇！

7 岁那年，与我同龄的孩子大都上学念书，我央求母亲也要上学念书。母亲说，你哥哥因交不起学费，念不起书，如今你又要上学，没有钱，不能去。我又哭又闹得了一场病，母亲无奈求人说情，学校答应减免部分学费，我能念书了。上学前一天晚上，我高兴得一宿没睡。

但是，我并没有按部就班连续读书，每逢学校催要学费，

就在家猫几天躲躲；家里没柴烧或父亲在街上卖菜需要哥哥和我帮忙，就不能去上学。虽然经常“旷课”，但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差，因为我很用功，知道上学念书来得不容易。

买不起书包，妈妈给我准备一块布，我把几本书和笔用布包起来提在手上，学校统一订制学生制服，我家没钱也不能做。学校开运动会，各班列队入场，我没制服不准入队，被拒之在外，对我刺激很大，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我跑得快，老师为争成绩，让我参加赛跑，我赤脚跑在前面，给班级争得荣誉，我也感到自豪和慰藉。

我上小学老师给起名：刘自强，到鹤岗以后我自己改为：刘自然，至今。

一年级语文课本中有“我爱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向国旗敬礼！并绘有国旗及人们向国旗敬礼的插图。学校操场旗杆上悬挂着国旗，礼堂挂着国父孙中山画像，老师教唱的第一首歌，歌词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十二年三月廿（读：年音）六日，期满了它还不交还（“十二年”指公元或民国年号，无考证）”。那曲调现在还能哼出来。

上学念书我就知道了：我们是中国人，日本侵占我旅顺大连。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消息传开，人们奔走相告，人心慌慌，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紧接着通辽县城开进不少中国军队，说是在这开战，市场上一片混乱，有抢购粮食油盐的，也有准备逃亡避难的。天空出现双翼飞机，机翼上画着日本太阳旗标志，飞得很低轰轰作响，向下投掷炸弹，死伤很多人，驻有骑兵的大车店，马匹被机枪扫射死很多，房子也被拦腰炸断，学校没法上课了，我们躲在家

里不敢出门,战争的灾难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了。

日本军占领沈阳后,兵锋直指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很快就攻占了郑家屯,接着又攻进了通辽县城。

9月下旬的一天早上,东城门外响起隆隆炮声,父亲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全家盲目地跟着逃难人流向城西拥去,人群中还有赶着牛羊的,孩子哭老婆叫,那悲惨惊慌情景,现在只有在反映那个时代影视中能够看到。

出了城西到我父亲的同乡“刘大脚”家躲藏,过了晌午枪炮声停止,恢复了“平静”,我们又随人流回到家里。一路上各商店门窗紧闭,衙门及大街上挂出日本旗,中国军队逃得无影无踪。满街日本军人枪上刺刀,见行人就搜身检查,叽哩哇啦叫喊很凶,装甲车满街横冲直撞。我跟在大人后面吓的不敢吱声。

学校停课了,跟着哥哥拾柴、帮助父亲在街上卖菜。街上张贴告示,限令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商店开始营业了,学校迟迟不开学,据说,因为没有课本。

第二年春天学校开学了。操场旗杆换成“红兰白黑满地黄”旗帜,礼堂孙中山画像不见了,换上“执政”的溥仪像,课本全换了,凡印有中国字样课本都得烧掉。

老师告诉:现在是“满洲国”,我们是“满洲国人”。在我小小心灵中纳闷:那么多中国军队为什么不抵抗,见日本军队就跑!我们又一下子成了“满洲国人”了,一切变得这样快,但就是一样东西没变:富人还富、穷人还穷。我家日子还是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

事变后第二年夏天,通辽县闹鼠疫,死了很多人。站在街口上就看到往城外运死尸,车拉人抬整日不断,嚎啕痛哭声不绝于耳,许多死人用破席卷着,外面露出两只脚,也有用棺

材、柜子的，凄惨已极，目不忍睹，人心慌慌，不可终日。那时，通辽县是鼠疫重灾区，死亡上万人。当时根本没有医药及防治措施，得了传染病生怕日本人知道，一旦被发现就要强行把病人拉走“隔离”，根本不给医治，不等断气就拉出去烧（火化）了。那时，人们都吓的要命，猫在家里不敢出门。县城四周挖壕沟架电网封锁起来，不准出入县城。母亲跪在佛前烧香叩头，祈祷保佑平安。万幸，那场大难我家没有人被传染，逃了过来。可是闹鼠疫次年的夏天，我家得了“窝子病”（即伤寒病），也是传染病，父亲先病倒，接着兄妹和我也都病了，最后母亲也倒下了。持续发烧不进饭食，周身无力说胡话，整日昏睡，根本没钱买药看病，只有听天由命硬挺着。二妹（桂云）病情最重，躺在炕上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眼看就不行了！后来用偏方，将生绿豆碾碎泡水喝，竟奇迹般活了过来，穷人家孩子命真大！

在全家患病期间，外祖母来我家帮助拆洗衣服被褥，没有肥皂，就把烧柴灰盛在筐里，用滤过的水洗衣物，外婆教育我们要讲卫生，告诉我们臭虫、蚊子能传染疾病。父亲母亲因为日子穷，又患病，整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外祖母就鼓励说，马粪蛋还有发烧的时候，人只要有骨气，总会有时来运转之时；再穷也尽量让孩子多念点书，长大成人，只要肯干，总有出头的日子。

我外祖母没念过书，但她说的这些话确是至理名言。她还说：“一个男人肩膀有劲能养两三口，心里有劲（指有文化）能养五口还多”。这些话至今我还记得，并在我成长中起着作用。外祖母还说，让你父亲上矿山（鹤岗）挖煤去吧，那里工人赚钱多，每天吃白面馒头，孩子上学念书不花钱。我羡慕极了，盼望全家上矿山，我要上学念书。

举家北迁奔鹤岗

11岁那年,家里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能变卖的东西几乎全卖光了。母亲陪嫁的银手镯也拿出去典当了,记得当时我跟在母亲身后,母亲不情愿地将手镯摘下递上高高柜台,当铺掌柜接过来,用牙咬一下,认为成色可以,说二元钱。同意后开具“当票”,上写“银手镯一付,典当二元,限三个月赎回,逾期由当铺处理。”而现金只给一元八角,提前将利息扣除了。我从小就最恨两铺:当铺和药铺。它们太黑太狠,喝穷人血。

当时,我的二舅、三舅、四舅都先后去了鹤岗,二舅在鹤岗煤矿专用铁路当调度员,四舅当调车员(打红绿旗),三舅做生意,他们都干的挺好,生活有保障。外祖父母提议,我父母同意了,于是我们全家决定迁转鹤岗。

1935年夏,四舅父回郑家屯结婚,我们全家集中到郑家屯外祖父家,等待四舅父完婚后随他北上。结婚那天早上,准备两台花轿,四舅坐一顶在前,另一顶接新娘在后。当地有个习俗,接新娘的花轿去时不能空着,要找个童子压轿,让我坐上去。上轿前要我去撒尿,说中途有尿叫停“犯忌”。到了新娘家下轿时给我一个红包,内有五角钱,我高兴得不得了。一是头一次坐花轿,很好玩,二是得五角钱。许多年后回鹤岗探亲,与当时健在的四舅母谈及此事,大家都开怀大笑!

7月下旬,骄阳似火。我们全家8口(父、母、兄、姐、3个妹妹和我)顶着烈日带上行李及所需物品,跟随四舅由郑家屯出发乘火车去鹤岗,同行的还有大我1岁的表哥作义(他是暑假回郑家屯看奶奶的)。我们在四平街车站转车到哈尔滨,

换乘江轮《哈尔滨》号沿松花江顺流而下抵连江口，一路上，我们兄弟姐妹6人，懵懵懂懂地跟随着大人走，那时哥哥只有14岁，妹妹（自清）最小，由母亲抱在怀里，上下车船换乘时，大人抗着行李走在前面，兄妹们很怕掉队一个拉着一个跟在后面。大人说，谁丢了就再找不到家了，我们就更害怕，紧紧拉着手互相呼唤着，真象逃荒的，不！我们就是在逃荒！

连江口——鹤岗铁路是鹤岗煤矿修建运煤的，50公里路程火车运行2小时左右。我们在连江口贮煤场主管王海胜（郑家屯人，舅父朋友）家吃饭休息。这时，大人孩子都欢喜万分，眼看要到达目的地了，很快就能吃饱肚子了，我更高兴的是能上学安心读书了！

010 中午，我们搭乘开往鹤岗的客货混合列车，前边10多节是货车空车皮，后边是3节客车，四舅父认识车长和列车员，没买车票就上车了。父母、姐姐及3个妹妹在客车箱里，四舅父领着哥哥、表哥和我上了空车皮里，因为正是伏天，火车跑起来比在客车里凉快。

火车行至俊德屯站（鹤岗前一站，现称新华），距鹤岗只有15公里，眼看快到了，一场意外事件发生了！

列车从俊德屯站开出不远，突然发生强烈震荡、颠簸，象要翻车似的，火车脱轨停下了。同时，枪声响起，交枪不杀喊声不断，不多时，随车4名乘警缴械投降，战斗停止了。

这是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所部夏仁杰率领的部队拦截火车。他们得到情报：鹤岗煤矿郭矿长（一把手）携带巨款及大批拟武装矿警队的枪支弹药，搭乘本次列车返回鹤岗。据说，郭矿长事先得到截车信息，没有搭乘本次列车。

此次战斗，抗联缴获了4支枪、俘虏4名乘警，从旅客中搜出一个日本人，作为战利品强行带走。将火车头砸坏，放火

烧着车箱。

抗联战士将旅客中青少年召集到一起,约四、五十人,让这些人跟随队伍爬过一道山岭,来到临时宿营地。他们队伍身着军服、警服及老百姓普通衣服,很不整齐;武器有长枪、短枪、也有扎枪、大刀,还有马匹。一律戴写有抗日联军字样红袖标,都很年轻,个个精神抖擞,很威风,待人和气,不打骂老百姓,从他们说话中听到,其中不少是朝鲜族人。

夏仁杰,高高个子,嘴上有八字胡,穿一身军装,身后跟随二个挎盒子枪警卫员。在临时宿营地,给我们这些被带上山的人讲话,大意是: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鬼子,动员青少年参加抗联;同意的留下,不同意的回去。讲话中间,天空出现日本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下令大家就地趴下隐蔽。这时天色已晚,飞机离去。肚子饿了,招待我们吃的是用铁锹烙的白面饼,油很少,呈焦黑色,没有菜,吃的很香很饱,这是一餐很有纪念意义的抗联饭。

天黑后,由抗联战士领路把我们送到俊德屯车站,搭夜间货车抵达鹤岗,此时,已是中夜时分。

在这次拦截火车枪战中,我年仅12岁的姐姐不幸中弹身亡。那年是她的本命(猪)年。过生日那天,妈妈给她一条红布裤腰带系在腰间,她象《白毛女》中喜儿从爹爹手中接过红头绳那样高兴!老人说,她就埋在遇难的铁路旁一棵树下!这是我家北上途中的不幸!

记得姐姐9岁那年春天,大人不在家,姐姐想喝水,缸里水不多了,她个子小,蹬着锅台弯腰舀水,不小心头朝下栽到缸里,哥哥听到呼喊救命声赶到,用力向上拉双脚想把她拽上来,可力小拉不上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邻居比哥哥大二岁哑吧男孩跑过来,用手比划哇哇叫并和哥哥一起用力把缸

搬倒，将姐姐救出来。

万万没有想到，姐姐那次幸免于难，而这次在举家北上的途中，在即将能吃饱饭的前夕，却不幸遇难，离开人世，长眠于荒野之中！每当想起此事，都令我心酸落泪。

姐姐一天书没念，家穷不供女孩上学。从能干活那天起，每天帮助母亲做家务，带弟弟妹妹，任劳任怨，整日就是干活。学校作徒手操，要求戴白手套，是姐姐一针一线纳10双袜底赚的一角钱，给我买的白手套。姐姐个子不高，白白园园的脸，扎着辫子在身后，总是那么整洁，她的容貌我至今仍有记忆。每当我途经俊德屯（今新华）时，总要凭窗望着铁路旁的一棵又一棵树……。

安家鹤岗

到鹤岗之后，我家住在离老火车站（二舅父家就在老火车站附近）有50米左右的两间半草房里，这是二舅父为我家租用的。房前屋后全是荒地，蒿草长的有一人多高，草丛里有野生黄花菜、臻子树，下过雨还可以拣到蘑菇、木耳，到处是“宝”，把我乐的直蹦高！这真是一块富饶的土地。

父亲到煤矿南二槽露天矿当搬运工，每天上班干的活是用绞车把矿车拉到地面，再推上站桥倒入车皮，活虽然很累，但能按月开工资，每天下班后拣块煤用小麻袋背回来，家里做饭取暖足够用了。哥哥到木匠房学徒，不赚工资，只带出一张咀，也为家减轻负担。

生活安定下来，不再为吃饭发愁，包米楂子饭、全麦粉（通称黑面）馒头，每顿饭不限量、“不分份”都能吃饱。房前屋后喂猪养鸡，开荒种菜，土豆、萝卜、白菜自给有余，还可送

亲戚家用。烧的更不成问题,除父亲背回来外,车站铁路旁落地煤随处可拣。这里的气温虽比通辽寒冷,屋子里烧的很暖和。

当时,鹤岗煤矿规模不大,整个矿山只有万余人口,当地仅有日本驻军,煤矿还没有日本人。矿工的日子还好过。

1935年9月,我又上学了。鹤岗煤矿职工子弟小学校的经费由煤矿供给,所以不收学杂费,还给学生发课本。学校师资水平上乘,共百余名学生。校址在公司大院内,校舍崭新,窗明几净,黑板、课桌、椅子全新,鼓号队及体育设施各种球类齐全。总之,是鹤岗唯一的一所一流小学,我上学后无论寒冬酷暑没有缺过一天课,全身心投入学习,连续几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得了不少奖品。

校长刘继升兼教语文,他精通古文,除课本教学外,将《论语》、《孝经》纳入教授内容,还将《古文观止》中脍炙人口的《陋室铭》、《醉翁亭记》、《五柳先生传》等篇章油印发给我们,让先念熟再背诵,然后由他津津乐道地讲解。使我们从课本以外多学了一些东西,同学们回忆这段学习生活很感激他。“八·一五”后,鹤岗煤矿发动工人清算汉奸把头罪行(“刮大风”),有人说他效忠日本,宣传奴化教育,他躲风去沈阳女儿家猫了起来。据知,现已逝世。他是个好人,是很有学识很负责的老师。

课余或节假日帮助家里干活,放学回家路上见到树枝煤块顺手拣起,已形成习惯。从会走路起,我一年四季脚上穿的都是母亲做的布鞋,到鹤岗第一次穿上买的太阳牌胶鞋,我高兴得很,走路格外小心,怕弄脏弄坏。一天早上天气晴朗穿着新鞋上学去了,放学时,雷雨大作,道路泥泞,我把鞋子脱下拴在一起,挎在脖子上赤脚走回家,同学们有的嘲笑我,我

不以为然,置之不理。

我家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但与那些监工把头、大职员等所谓白领阶层家比较还相差甚远,上学时,人家饭盒里装的是鱼肉、大米、白面,有的是佣人午间趁热送到学校,而我带的是全麦粉馒头加咸菜。老师对白领家子弟偏爱,教授也耐心,可那些人学习并不努力,考试成绩很差。我学习努力,成绩超过他们。这样从心里找到一点平衡和感到自慰。

小时候非常喜欢唱歌,老师教唱歌,说我学的快唱的好;学生集体唱歌让我“起头”(领唱)或“打拍子”(指挥)。我还是学校鼓乐队主力,文艺汇演积极份子。刚到鹤岗时,老街基戏园子经常有煤矿职工业余演京戏,免费入场,我从不缺席,《空城计》、《五家坡》等唱段我也能唱出来。这个剧场后来被日本人取缔了。

1937年春,张喜芝、王天衡返回学校读书,他俩是1935年夏抗联拦截火车(即我家来鹤岗那次)动员参加抗联的,因条件恶劣,年令小(14-15岁)想家,被送回来的。回来后遭日本宪兵队传唤,从此,人们问及抗联情况,他们守口如瓶。

童工生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煤炭是重要战争资源,鹤岗煤矿煤质好、贮量大,大批日本人来到煤矿,进来大量机器设备,扩大生产规模,疯狂掠夺我煤炭资源。

我家住的两间半草房已经买下成为自家房产,但地号是煤矿的。煤矿扩大生产规模,占用该地,下令拆除,准予在新

立屯自建住房。到鹤岗后我又添了两个弟弟，9口之家仅靠父亲一人赚钱养活已很拮据，生活难以维持。新的3间草房盖好我家迁入新房，欠下一笔债，父亲从煤矿辞工下来，在街头摆摊卖鱼卖菜。这年冬天父亲决定不让我念书，他说念书是有钱人家孩子的事，咱穷人凭力气干活吃饭养家糊口。无可奈何，为了家庭生计我不得不放弃学习。我的同龄人多数都在学校读书，我的学习成绩比他们好，却不能念下去了，精神沮丧，埋怨老天爷为何这样不公平！

1938年，我14岁。父亲曾立下不成文的家规：凡年到14岁，就得干活赚饭吃，他自身如此，哥哥和我以及后来两个妹妹都是14岁就上矿干活赚钱养家。我14岁那年，由哥哥托煤矿劳务系的郑家屯老乡陈沛霖帮忙，送我到鹤岗煤矿选煤场当勤杂工，每日打扫卫生、烧开水、沏茶或去公司取送表报，午间为场长（日本人）取饭盒。按规定是10小时工作制，而我要早去晚归清扫办公室卫生，冬天两头不见日头，上下班要走5里多路。日工资四角五分，星期天、节假日休息无工资，每月能领12元左右。按当时行情能买100公斤包米楂子，干活虽很辛苦，对家里生活是个可观补充，觉得能挣钱养家也很惬意。

每月领工资要出具个人名章，在老街基孙刻字铺刻篆体“刘自然印”印章一枚，材料系白塑料圆形，至今还保存在身边。它是件纪念品，它也是我童工痛苦生涯的有力见证。60多年保存至今，它也是我身边保存时间最长的一件珍贵物品。

半年后，我跳厂到鹤岗发电厂继续当勤杂工，是在该厂当工人的李表舅（是我舅父两姨弟）介绍去的。日工资六角钱，劳动与选煤场相同，每天要给厂长（日本人）烧洗澡水，澡盆是铸铁大锅，底很深，坐进去能浸泡全身，将澡盆刷洗干

净，灌满水，用木拌子将煤引燃，把水烧热，弄不干净或烧不热要挨骂；有时还为他家干活、看孩子、上街买菜。这些活对当时只有 14 岁的我，很不轻松。

当时发电厂有二台机组，职工百余人，从厂长到车间主任青一色是日本人，班组长一半也是日本人，同是班长日本人比中国人工工资高三、四倍，还有种种特殊津贴，他们盛气凌人，以征服者自居，同工不同酬，民族压迫不平等十分严重，到处是日本人的天下。在发电厂忍气吞声干了一年，饱尝了亡国奴的滋味。

一年半的童工生涯深深感到，挣钱不容易，要想改变贫困处境没有文化技术是不行的，继续读书的愿望在心中始终存在。盼望着父兄多挣一点钱，让我去读书吧！

继续求学

1939 年秋，家庭生活条件稍有变化，我又回原来小学插班读书。

哥哥学木匠三年满徒，长成大人了，在煤矿当木匠，每月有了工资收入，这对我家经济收入是很大帮助，父亲继续做小生意，把因盖房子欠下的债还清了，家里生活有了保障。经父母亲同意哥哥支持，我又通过同学张文卿取得刘校长批准，继续上学读书，年底高小毕业。同学们纷纷报考上一级学校，不报名的是自知成绩不行，我继续求学的目的就是上中学。父母不同意，说念中学（鹤岗没有）要去外地，住校食宿费用太高家里供不起。没办法我找来三姨母孙雅琴（医院助产士），她苦口婆心反复向我父母作工作，总算说服我的父母同意了。我的两个小妹妹能够上学读书，也和三姨母的努力